

在京中青年学者谈民族教育

1996年12月19日,《民族教育研究》学刊编辑部邀请在京民族学、教育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学科的中青年学者,在私立华诚学校召开座谈会。^①围绕“面向2世纪的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社会与教育”展开了深入的讨论,现将部分讨论内容刊出,以飨读者。需要指出的是:这是一次纯学术讨论会。讨论会本着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各抒己见。其中某些观点和提法并不是定论,也不代表编辑部的观点。刊载这次座谈会研讨内容旨在引起社会各界对我国实施多元文化教育构想的关注,并希望对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工作有所启示,引发人们对民族教育作更深刻的思考和探讨。

本次座谈会主持人、《民族教育研究》学刊主编滕星首先发言。他说:当前世界由2000余个民族、200多个主权国家和地区政体组成,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多民族构成了世界多文化的背景。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进步与普及,加快了全球一体化进程,“地球村”的概念应运而生。这与全球多元化发生了冲突。人类在进入2世纪之前面临两大挑战:全球一体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冲突与和谐;国家一体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冲突与和谐。那么,2世纪教育在多民族国家中担负何种社会角色?2世纪教育在多民族国家中有什么社会功能?滕星主编认为,仅靠政治、军事、外交手段来解决民族关系与民族矛盾只是权宜之计,实施多元文化教育才是根本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人类文化的多元化是人类进步的象征。

多样性与统一性哪个更好,这一直是哲学上争论的问题。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模式?统一模式还是多元模式?我国现在的教育模式基本上是一元文化的教育,这种模式曾对国家统一产生过重要作用。但这种模式对我国其他少数民族是否公平?对中华民族——复合民族的长远发展是否有益?民族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我国而言,广义民族教育是指56个民族的教育。狭义民族教育专指我国55个少数民族教育。民族教育可以是单一民族的教育,也可以指复合民族的教育。在世纪之交,在人口为多民族成分的现实下,我国教育应采取什么模式迎接两大挑战?因此,《民族教育研究》编辑部(全国唯一的民族教育理论研究刊物)邀请在京民族学、教育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多学科中青年专家和学者举办座谈会,共同探讨这一问题。大家可就以下一些问题进行广泛的研讨,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 (一) 2世纪人类文明面临的两大挑战:全球一体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冲突与和谐;国家一体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冲突与和谐。
- (二) 2世纪教育在多民族国家中的社会角色、功能与模式。
- (三) 2世纪中华民族(56个民族)教育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 (四)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与少数民族教育。

^① 参加会议的代表有: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教育研究所所长滕星(《民族教育研究》主编,在职博士候选)、王军(《民族教育研究》副主编,在职博士候选)、常永才(硕士)、董艳(在职博士候选)、民族学系庄孔韶(博士)、王建民(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周星(博士);社会学所钱民辉(博士后)、高教所陈向明(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康健(博士);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程方平(博士、私立华诚学校校长)、毕诚(博士、私立华诚学校校长);北京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毛祖桓(博士);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纳日碧力戈(博士)、周庆生(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胡鸿保(博士);私立华诚学校刘珊(校办主任)等。

庄孔韶博士的发言

1. 泛论 2 世纪中国国民教育的三个要点

关于进入 2 世纪的中国国民教育,就大的方面而言,应重视城乡教育、正规教育与民俗教育、汉族与少数民族教育三个要点。

城乡教育带有不同的区位特征,智力财富向城市中心集中的同时,还应考虑何种教育手段可以使乡土社会受益。中国的教育家六十年前就提出过这样的见解,然而,知识回归乡土的问题至今犹存。

正规教育与民俗教育的关系在于正规教育内容与方法的缺失刚好为民俗教育所填充。在文化的传承过程中,应反省一下,正规教育的某些实践效果远远不如乡镇民俗活动、民俗教育的吸引力大,原因何在呢?当你的教科书、教师、报告与演讲不能解答或回避解答关于生存、社会、生活、愿望、信仰与寄托等问题时,民俗与民间信仰正在热情地接待他们。21 世纪的教育规划设计者如何使这二者携起手来呢?

各种族群文化的长久存在都是有道理的或可以解释的。因此,南北汉族诸地方族群与少数民族族群之间首先有一个加强相互理解的问题。各界人士主动学习关于不同族群文化的知识显然是诸族群(含现代各种流动人口)文化沟通的前提。然而,学校在民族教育实施过程中,关注教育学的原理与目的(学者)、国家政治的目标(国策制订者)、以及多元文化整合的方式(族群成员),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实需要加以综合研究,做田野调查的理论建构不可偏废。

未来的城市新人、田土牧业固守者,以及移动族群人口将给 21 世纪的中国教育带来充满新意的,抑或是一些异常棘手的问题。

2 世纪之交中国教育情境的严峻性

本世纪末所观察到的中国教育情境有了一些改进,特别是一些学校和专业设置上,使内容与科技发展、市场经济挂了钩。但另外一些方面仍具严峻性。表现在一些明显不正常

的教育现象尚无力制止。例如,陈旧性教学大纲、课堂上的注入式、题海战术和单纯追求分数等,至少是不经济的教育活动。进一步说,中、小学课堂单向灌输和死背应考的本质是一种重复性的实践;如果大学教授让研究生只求寻找自己理论的佐证,其本质也经常是一种仿效性的实践。这两种实践均不是创造性的,因为上述教育方式是以已经完成了的形式存在着。唯有能够产生新的判断、新的构想、新的概念的教育设计才是创造性的,因为这种实践能产生超越先在的因素的新客体。下一个世纪的中国学校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善这种约束性的教育情境呢?

学校与社会的紧密关联之一,是学校与社会现象的同一性。一个学校把强调集体主义精神外在化,结果评选上的“优秀班集体”有时并非名副其实。就像社会生活中有些镶上“卫生信得过单位”牌牌的饭馆仍令人望之却步一样。类同或相关的现象诸如:把学习和社会活动(如会议过程,职称评定过程,接受上级检查工作,机构设置裁定等)变成一种存在的形式,因为在这种形式发生之前,已确定了先于实践而完成的观念。此外,因好礼而虚伪文饰,由奉迎而流于浮夸,也是常见的最没有风险的明哲保身的活动,是与当前改革的求实精神背道而驰的。这证明学校教育中的重复性实践同社会生活中外在的、形式和官僚的实践之间有着既可见、又隐蔽的关系,对这种关系的教育研究将为估计 21 世纪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教育的发展走向提供重要的基础材料。

周星博士的发言

当我们在谈论“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社会与教育”这样一个重大的命题时,我们是

充分意识到了就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将面临的历史机遇及其挑战:我们如何在全球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保持我们自身的民族文化的特性,以及如何理解一体化与多元化之间的纠葛与协调?显然,我们面临

的是一个双刃之剑。我们必须同时意识到中国国家的一体化和各民族,甚至包括各种地域社会在内的多样性之间可能存在的所有问题。一体化意味着全球各国和中国各族人民所共享的文化与文明的成分及因素不断得以成长和壮大,多样性则意味着各国、各民族,及各种地域社会的文化传统的存续与再生。这些传统不仅是截止目前人类所有文化与文明的主要表现形态,而且还是人类进一步创造新文化与新文明的源泉;它们不仅是使人类各个族群与各种地域社会所共享的一体化趋向的文化与文明得以成长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它们还为人类各族群和各种地域社会里人们生存的意义,及人们生活之幸福的价值提供着不完全相同的界定。如果“发展”和“一体化”的目标,不只是经济理性的,那么,“传统”和“多样性”就应该得到足够的关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理解未来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社会与教育时,费孝通教授提出的“多元一体”理论,或许能给我们以很多启示。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或作为一个族际社会,如果能够持续保持多元一体的格局,并以此种格局介入国际社会生活,那就不仅能够对维持全人类文化与文明的多样性作出重大的贡献。同时,又能够拥有足够的力量,以一个整体存在,从而提升中国各民族人民休戚与共的尊严和地位,共同赢得更大发展的空间和机遇。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的社会,也就是族际社会。在我看来,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族际社会,是由许多大大小小的地域性的族际社会组成的,不同地方的地域性族际社会,其民族构成及文化多样的具体情景也常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除面临一般性的一体化和多元化的问题之外,还应该充分考虑到其在不同地方的族际社会里所实际发挥和我们认为应该发挥的功能。就是说,族际社会里的学校教育,在不同地方所面临的问题也许并不完全相同。在一个拥有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人口基数又有一定规模,在较大

的行政区划里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族际社会里,双语文的学校教育体制,即便成本很高,通常也是不能回避的;而在一个族群人口基数不大,又是多民族联合实行区域自治的族际社会里,汉语文已经成为实际上的族际共同语文的背景下,其学校教育面临的问题自然很不相同。前者我们可以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代表,后者不妨以我们不久前曾经作过调查的云南省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为例。

我们所说的学校教育,通常是一种由国家支撑的制度化的传授知识和传递文化的体系,在多民族的中国或者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族际社会里,学校教育显然具有一体化的功能,即它是超越不同地域性和不同族群性的,基本上是全国统一体制的,因而它也是以增加全民共享的知识与文化因素为己任的,它致力于不断地把各种地方性和族群性的社会卷入到一个更大的族际社会里来。即便在我们现有的“民族教育”这一概念下展开的种种教育实践,即便我们欣喜于完整的“民族”性的教育体系的成立,但它们往往更多地强调受教育对象的族群特性,而不是与其族群特性相联系的文化特性,这一点或许值得我们反省。问题在于实际形成的隔离式的“民族”教育体系,固然也增加了族际共享的知识与文化,但它是在整个国家学校教育体制中自成独立系统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脱离于那个更大的族际社会,脱离于我们谁也无法回避的主流社会,因而更多培养了受教育者的民族意识和族群观念,而不是族际意识和公民观念。我国现行的学校教育体制,具有应试型和升学型的特点。因此,在边远地区的一些族际社会里,至少对于当地的少数民族族群来说,学校教育有可能传授的是一些来自“外面”或“上面”的知识与文化,而通过接受学校教育而获得成功的人,尽管非常有限,也还是以离开当地社区为首要选择的。这意味着,学校教育具有外来外去,在当地的少数民族社会,甚至地方族际社会的生活之外自

成循环的属性。显然,这种状况使得学校教育所应发挥的社会功能大打折扣。

在我看来,未来族际社会里的学校教育的改进,最重要的首先是应在教育的制度安排及其创新上有所成就。比如,如何突破隔离或“保留地”式的自成 一统的“民族”教育体系,真正把它纳入到族际社会的大教育之中去,或者这样的“民族”教育体系,不仅应以少数族群为对象,同时也能够以多数族群为对象,因为在族际社会里,不同族群间的和睦共处,更多地是取决于如何使得多数族群的人们得到有关族际社会里文化多样性观念的基本教育。又比如,如何使得族际社会的学校教育,不是更多地强调受教育者的族群特性,而是其文化特性;如何使得族际社会里学校教育所培养的人,不仅具有本族群的自尊与自信,还具有在整个中国的族际社会里,甚至在更为开放的全球 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理解本族群的历史、文化及发展前景的境界;他或她不仅应该具备继承传统的能力,同时还应具备发展传统以及在多民族的族际社会里发展和成功的能力。

最后,我想说的是,中国族际社会里的各个族群,近代以来始终共同面临着“被”现代化的命运,现在当我们在全球 一体化的浪潮中不甘人后、积极进取时,我们必须同时为中国各族群共同、共享而又多样的传统及文化特性的延续与发展而努力。为了我们有力量去在下一个世纪发展和竞争,我们需要凝聚力,需要团结,需要以一个整体出现,但这个整体的凝聚不能以我们各族群的文化流失为代价,我们依然需要持续不断地相互学习,持续不断地学会相互尊重彼此独特的传统,并把它们视为创造更多的族际共享的中国新文化与新文明的最为重要的基本素材。学校教育显然能够在这个中国新文化和新文明的未来创造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它首先应该增强在传授文化多样性方面的功能。

程方平博士的发言

作为多民族的国家,中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民族文化和民族教育的发展,尽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包括所谓的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论者)和不平等的现象存在,但中国数千年的社会文明史为各民族共同创造这一事实已为世界所公认,并被今人作为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据。

统而言之,民族文化是民族教育的内容背景和土壤,民族教育是民族文化赖以保留、发展的基础和工具,二者互为因果,并同样具有很强的再生力和影响力。作为多元 一体的国家,中国应在国家安定、统一的大前提下,对民族文化、民族教育进行更深入的调查与研究,更深刻的理解和尊重,更有效地运用和扶持。因为这一切不仅是中国走向世界面向现代化和未来的本钱,是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资本与特色,更是中国走向新世纪、参预更激烈的国际竞争的重要基础,是活力和动力,也是内聚力的所在。

所谓的民族文化,是千百年来,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交流、语言、生产活动、宗教、习俗等形成和积淀下来的,既有外在形式,又有内在心理区别的、有形和无形的文化。是既有相对独立性和地方性等特点,又与其他相近、相关的文化有诸多交叉包容性和千丝万缕联系的文化现象。其发展必须首先依赖于教育,必须改善文化与教育所处社会的整体环境和运行机制。和政治、经济相比,文化和教育的作用和影响是“深”且“远”的。其涉及面的广泛,既包括有诸多的领域,又有上下不同的层次,应将其视为综合性的复杂的整体。影响其变革的要素既有外部的竞争、物质需求的刺激,又有自尊、维护传统等内趋力的影响,而且正负效应均会时时在其发展、改革和调整中出现。为此,发展民族文化和发展教育必须同步进行,突出其特色和整体性,协调其在社会整体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促进民族教育和民族文化的发展,要给

特殊政策,这种特殊政策的出发点不仅在扶持,更重要的是在“激活”,增强其自身的活力。将其培养目标、教育模式、教师素质、教学设施、教材、教法、教育评估等与国家乃至地方的需求、观念、人才市场、经济特点、语言环境等各方面交流与改革协调起来。可以说这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必须有政府及全社会的认同和支持。目前,在这方面还有许多欠缺,还有许多因人为和“无意识”造成的障碍和不平等。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在跨世纪的重要历史时期,在穷国办大教育的沉重现实面前,必须认真慎重地审视民族文化和民族教育的发展与改革问题。首先,应通过扫盲和义务教育普遍提高民族文化的基础水平;其次,通过先进的教育技术扬长避短,缩小差别,努力普及先进的教育;第三,合理规划地方和民族人才结构,以适应地方和民族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需求;第四,引导和培养民族文化和教育需求,以期达到与全国多元一体格局的一致,与社会整合目标相同,求得局部与整体的协调,相互促进,相互激励;第五,改善民族地区社会的整体运行机制,充分发挥民族文化和民族教育的作用,使各级各类民族人才学有所得,有用武之地,能应付各类挑战,增强整个社会对民族文化和教育的重视与信心,为其发展开辟更广泛和美好的前景。

王军副主编的发言

近年来,多元文化教育这一概念及理论开始引入我国。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教育理论流派,我们的民族教育界应予以高度的重视和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对其实践效果作出客观、科学的评价。然而,在我国现阶段全面倡导多元文化教育是否合适?我认为应持慎重态度。理由之一,该理论源于西方国家,问题提出的视角、文化社会背景等与我国不尽相同。大家知道,多元文化教育始于本世纪六十年代前后的美国。它是在以美国黑人为首的少数民族集团等反对文化同化的运动中逐步

形成的,其核心理念是保证弱小民族集团的儿童接受平等教育的机会,和促进多元文化社会中人们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为此,美国著名学者班科斯提出将多元文化教育分为五个阶段:即以特定少数民族集团的文化为课程内容的“单一民族学习”阶段;综合种种民族集团文化的“多民族学习”阶段;以改善整个教育环境为目标的“多民族教育”阶段;不局限于少数民族,也包括女性、残疾人、宗教集团、偏僻地区居民等弱小文化集团在内的“多元文化教育”阶段;以及将上述几个阶段综合起来的“制度化”阶段。而英国的多元文化教育,则是伴随五十年代以后来自印度、巴基斯坦等“有色”移民的大量增加而登场的。从七十年代初期起,先后提出“多人种教育”、“多民族教育”及“多元文化教育”等。英国的多元文化教育的展开,始于让非白人移民子女融入英国社会的适应教育,之后扩展到包括移民在内的多人种教育,进而扩展至强调以人种关系为基础的民族集团文化的多元文化教育。再如德国的多元文化教育,它始于八十年代初期前后,主要是伴随外国移民劳动者的大量涌入而被提出来的。尽管德国有关当局对双语和双文化教育表现出很大热情,并采取一系列的援助措施,甚至鼓励从移民者的母国聘请教师向其儿童传授母语和文化等。但正如德国的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这一政策中隐藏着的方针之一,是将来能更容易地使一些移民子弟返回到自己的祖国。由此可见,多元教育的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中各国在理论与实践上有很多有益的经验可供我国借鉴,但重要的是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充分考虑到我国各民族在文化、历史等诸多方面的特殊性,对我国的多元文化教育加以客观和科学的界定,使之成为我国的各民族团结和共同发展做出贡献。

理由之二,多元文化教育不同于一般的民族方针和政策,它作为一种教育,要求必须具有操作性。因此,涉及教材编写、教学方法、教师、教育体制等一系列问题,应该说它是一

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实施起来有大量的难题需要加以攻克。除理论研究外,我认为有必要先进行一些小规模的实验。在摸索出经验的基础上,再加以展开。

还有一个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新课题——人口流动问题。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特别是冷战结束后,欧洲、美洲、亚洲等许多国家的移民人口急增。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一方面为人口流入国增添了许多活力,同时也引发出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尤其是语言、宗教、风俗习惯、价值观等文化上的摩擦,给人们带来很大困惑。这些巨大的冲突下面隐藏着本质是不同民族间的不同文化的冲突。另外,从我国的情况来看,随着改革开放速度的加快,近年来从北向南、从西向东、从内地向沿海、从少数民族地区向汉族聚居地区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已呈明显态势。巨大的冲突所表现出来的有地区性问题,也有民族性问题;有经济上的差异,也有文化上的差异。为了缓解这些矛盾,使这些文化上的冲突朝着文化理解的健康方向转化,我认为一个有效的途径是实施跨文化教育,即对处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人的一种教育。对此,我国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和操作体系。很多理论与技术上的问题需要我们的民族教育工作者与各界学者进行跨学科的交叉与合作研究。它既涉及民族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教育学等众多学科领域,也牵涉到社会体制、教育体制以及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它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性问题。而且从长远看,这种流动并不会局限于单向流动,将来必将出现反向流动和“文化复归”的现象。因此,我们有必要加速进行跨文化教育的有关研究。

陈向明博 士的发言

目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与世界各国多元的民族文化现实似乎形成了一种“冲突”,然而在“冲突”的基础上求得更高层面的整合与和谐不是没有可能。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意识到,民

族文化的多元是人类的财富,世界正是因为它多样性而丰富多采,而具有活力。事实上,一个国家只有具有和保留自己的独特性,才有可能在国际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才能对世界的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的多元对人类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人类的福分。

同理,在一个国家之内,民族文化的多元也是该国的财富。当然,不同的文化信念和习俗有可能给国家的治理和协调带来一定的难度。但是如果处理得当,多民族的价值观念和文化风俗可以给本国的人民带来更为丰富的精神生活、更加多样的思维方式以及更为色彩斑斓的社会习俗。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与其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国家的现代化必须在保存、继承和传播本土民族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如果我们的民族传统在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消失了,那将不仅是中国的悲哀,也将是全世界的悲哀。在我看来,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对民族文化的弘扬和光大。

教育是一个培养和锻炼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相互了解和理解的有效途径。由于教育具有传递、解释和创造文化的功能,我们在设定教育目标、建构教育体制、设计教学内容和手段等方面都可以想办法促进多文化之间的了解和交流。例如,在设定中国教育的课程体系时,我们应该对世界各国的文化和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情况加以介绍,使我们的学生对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所了解。当然,由于时间和篇幅的限制,我们不可能对所有的文化形态和历史发展状况都进行详细的介绍(而且事实上,这样一种做法往往容易流于形式)。我们所能做的应该是尽可能多地让学生了解外面的世界,尽可能公正地对不同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进行客观的介绍。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有一种意识,知道世界上存在着与自己不同的人,他们的长相和自己不同,他们有不同的文化观念、风俗和生活习惯。通过对异文化的介绍,我们可以

在学生身上培养起一种态度：一种尊重不同，乐于了解不同，愿意与不同的人和睦相处的态度。一旦具有了跨文化交流的宽容态度和理解能力，学生们在今后的生活和工作中便能够举一反三。

除了在教材、教法上具有多元文化意识，我们还可以创造各种机会让学生和老师们有机会亲身接触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实践中学会与他们交往。我们可以设法让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学生在一起上课，使他们在共同学习的过程中了解对方。学校应该尽量吸收不同民族的教师担任教学和管理工 作，这样做不仅使老师自己学会与异文化的人们相处，而且可以给学生树立一个榜样。我们还可以在国家、省、市和学校各级建立各种类型的交流项目，让与教育有关的各类人士都有机会与不同文化的人们进行比较深入的接触和了解。

在与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交往时，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同与异的关系，不要片面地求同。人类在灵魂深处具有很多共性，可是在行为表现乃至价值方面都存在差异。我以为，重要的不是人人都要成为一个样式，而是应该学会与不同的人和平共处。而学校具有传递文化传统，以及提供与他人交往机会的功能，是促进跨文化交往的极好场所。

王建民博士的发言

现在思考民族教育的发展应当有一些新的变化。要考虑到市场经济的要求。目前我国教育体制的转变是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展开的。在教育体制转变中，需要在适应和提高两个方面下工夫。适应即是适应市场向教育界提出的各类人才的需要；提高的关键在于效益上，必须考虑所学知识在未来市场的用途。所培养人才在未来岗位上能够发挥作用。

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少数民族地区和各少数民族人才需要更存在很大的差异，在教育过程中需要注意和分析市场的人才需求，将教育者、教育接受者与需求联系

起来，将教育与进行教育的场景中的文化联系起来。文化差异表现在教育中的重要性可以从以下不同的方面来考虑：包括教育方针、教学内容、考核标准与方式、教材、教法、课程组织方式等。在同类地区或城市中教育也应当考虑在不同层次培养满足不同市场需求的人才。既有为了发展国家的、地区的科技事业、社会科学研究所需的高级专业人才，以及这种高级人才的储备，又有大量适应各行业的有知识的劳动者。

依照计划经济模式组织的教学必然较少考虑人才市场的需求差异，文化被忽视也成为必然；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不考虑文化差异或小视由于差别引起的需求差异则没有什么道理。因此，应当在教育体制改革中更多地考虑多元文化。这个多元文化不仅是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包括了我国不同地区的文化。

当然，考虑多元化并不是要对抗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也不是与国家教育规范化相抵触。这里是强调多元文化的重要性，引发人们对教育过程中多元文化的认识，并不是要人们拿多元文化来作为对抗的武器或用来作为不按照教学规律和法则任意行事的借口。当今世界上几乎每个民族、每种文化都在经历巨大的变迁，许多过去的传统已经逐渐改变。强调多元文化、民族文化，不是依照民族志、按照人们对于传统的重构甚至编造，去穿戴色彩绚丽的服饰，去跳各具特色的舞蹈，去高唱情重意厚的歌曲，而是通过教育实现对于文化价值观的尊重，引导人们克服偏见，对他人的思维方式和意义体系加以了解。这样，人们就会鼓励各种文化形式的存在，理解它们的内涵，做到全社会成员的相互尊重。由此各民族的、文化的内容才可能逐渐变为更多人可以享有的国家的、世界的东西。

纳日碧力戈博士的发言

从孙中山先生时代的“五族共和”到中国共产党的“五十 六个民族五十六朵

花”,贯穿了国家一体与文化多元的历史主线。现代国家的模式原本来自西方,其中充满了民族征服和民族强迫同化。新中国在立足国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同时,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及其民族教育形式,非但没有进行强迫同化,还予以积极鼓励,使民族关系在总体上保持健康、稳定,其业绩超过了以往各个时代。然而,国内多数人,尤其是许多知识分子,由于对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和少数民族了解不多,在制造国家“现代化”话语的时候,容易使用他们本想对抗的霸权文化的语言,进入“同构”的误区。这方面的明显例子,就是忽视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甚至鼓吹在教学中完全用汉语代替少数民族语。这不仅是一个是否符合国家民族政策的问题,还是一个文化“习性”的问题。^①笔者愿意从民族主义、文化符号、心理边界三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希望能够指出误区的所在。

一、民族主义的误区

最近知识界有不少人鼓吹民族主义,其触角已经伸延到政治、文化和教育等等方面。在教育界有人在宣传、忽视,甚至希望放弃少数民族语言教学,不能够正确认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重要性。^②国家利用包括教学语言文字在内的教育体系体现主权和一体化格局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对于象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其中还会有许多变通和不同于其他一些国家的特点,那就是在统一的国家标准化教育体系中允许甚至鼓励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形式的存在,以多元的文化和教育形式表达和实践一体的国家主权和领土格局。事实证明这种做法非常成功。然而,有人将中国民族主义等同于爱国主义,^③有人把中国的民族主义说成是“知识界向正常的、较多元文化的心态回归”,认为八十年代的中国曾存在“逆向种族主义”的自虐狂热^④。其实,民族主义的本质就是要求族群边界(ethnic boundaries)和政治边界的同一,^⑤而在各个地区,由于历史、文化、语义系统等等方面的不同,民族、族群、种族的涵义及其相关的历

史和社会的实践也不尽相同。^⑥因此,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至少在中国是不能等同的。在中国制造民族主义话语的人,大多没有接触过少数民族和他们的文化,更少了解他们的心态。在他们的习俗、习性和思维中,没有少数民族的空间。然而,从孙中山先生“五族共和”到中国共产党的“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其间的历史不过百年,民族文化多元的事实仍然明显地存在,况且在中国的官方话语中民族与族群并不严格区分,因此鼓励民族主义在事实上也就鼓励了过去的“地方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从来就有一种竖敌的天性,从来就不具有容纳“多元文化的心态”,一种民族主义必然激起其他民族主义;原本是针对国外的民族主义,完全有可能挑起对内的民族对立。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二、文化符号与民族教育

文化的核心是符号功能,也就是一个事物对另一个事物的指代。只有理解这一点,才能避免把少数民族文化简单理解成为政治、经济或者语言文字等。民族教育及其民族媒介语言不仅用于民族社会的物质生产和再生产,也用于精神、感情和认知的生产和再生产。与其说文化符号是某种或者某些事物,毋宁说是一种关系。简单取消或者削弱作为文化符号一部分的民族教育及其原有媒介语言,无异于取消或者削弱原有的精神、感情和认知关系。所以,凡是发生上述取代或者削弱事例的地方,总会同时存在强大的反作用力。

^① 我们在这里借用布尔迪厄(布丢)的术语 habitus(习性,又译“惯习”),指人们在特定文化中养成的习性或者行为举止,它是肉体化的历史遗产,成为社会文化不自觉的一部分,个人没有能力完全摆脱或者完全认知。参见 Berre Bourdieu “Structures, habitus, power”《结构、习性、权力》, in Nicholas B. Dirks et al eds.: Culture/Power/History (德克斯等主编:《文化、权力、历史》),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② 根据我们的调查,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少数民族成员。

^③ 萧功秦:《民族主义与中国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载《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4期。

^④ 石中:《从‘逆向种族主义’到‘中国的民族主义’》,载《明报月刊》1996年九月号。

^⑤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民族与民族主义》, Oxford, 1983, p. 2.

^⑥ 纳日碧力戈:《种族与民族观念的互参与演进——兼及民族主义的讨论》,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年秋季卷。

因此,改革开放若要成功,就要关注和研究文化符号表达的关系。

三、心理边界与民族教育

根据班顿的说法,边界理论(the theory of boundaries)是解释民族和种族关系的五种理论之一。这个理论认为,人们利用体质的和文化的特征通过包容和排除来制造群体和类别,其中族群(ethnic groups)出自包容,种族类别出自排除;在群体互动过程中,变化的过程以取决于竞争形式和竞争强度的某些方式来影响群体之间的界限;尤其是个人之间的竞争倾向于消除群体界限,群体之间的竞争则强化群体界限。^①作为国家现代化的努力,最终实现个人与国家的直接联系,消除象民族这样的中间社群,当然是理想模式,但它的实现需要相当长的过程。过早地以某种民族主义代替国家主义,并且以牺牲其他民族的利益为代价,必然引起民族群体之间的竞争,在有可能消除某种或者某些物质边界的同时,反而强化了心理边界。国家一体化教育体制下的多元化民族教育形式和教育媒介,有利于超越民族心理边界,培养健康的人格,使国家公民身份有可能最终取代民族成份。

在中国如果鼓励民族主义,那就只能鼓励既对外也对内的民族主义,这有可能违反鼓吹者本意;民族文化符号具有民众性能产性、稳定性、变化性、历史性和可塑性的特点,它不可能单靠行政手段或者一两个号就能改变;民族心理边界是国家教育应当予以特殊关注的一个方面,它与民族教育及其媒介语言存在密切关系。

钱民辉博士 后的发言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于1994年9~10月对内蒙古苏尼特右旗、兴和县、商都县、镶黄旗四个地区的教育做了实地调查,从历史、现状、问题及趋势入手,分别考察了这四个县(旗)的普通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等。调查结果显示,这四个县(旗)的四类教育在以地区的贫困化为代

价呈非均衡的发展趋势。我在此仅从教育发展的问题和趋势两个方面提出民族教育所面临的危机,并未做出具体分析,也未提出拯救危机的思路,请与会专家学者各抒高见,为民族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思路和办法。

一、“投入”与“回报”的问题

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建国四十年来民族教育的发展与当地继续贫困化并存,教育不但没有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反而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负担。在这些贫困的地区,人们把脱贫的希望寄托于教育,有的地区将财政收入的66.5%拨给了教育系统。按1993年计,兴和县财政收入为980万元,教育经费占到652万元。随着教育的发展,教育经费比重仍在逐年提高。在这样贫困的地区,这么少的财政收入办了这么大的教育,当地政府哪有能力发展经济脱贫致富,哪有能力再对教育增大投入。而教育的回报是什么呢?以兴和县一中为例,1982~1993年间,共有719人考入大专或本科院校,355人考入中专。但是,考上区外的大学生毕业后没有一个人回兴和县工作。回到兴和县工作的大多为在集宁读书的中专毕业生和中师毕业生,但1993年仅回来50余人,1994年也只回来10人。事实证明,贫困地区办教育却在为发达地区培养人才。^②“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教育无疑赋予了受教育者社会流动的资本,但人才流失和地区贫困化继续存在的趋势势必造成少数民族教育的危机。

二、“避蒙趋汉”的语言教育问题

这个问题主要是由于民族地区贫困化造成的。建国以后政府对蒙语教育的投入很重视,建立起蒙语和蒙汉语授课的幼教、小学、中学、大专院校的教育体系。但这几年用蒙语授课的民族学校出现了生源短缺问题,而汉语授课的学校出现膨胀的趋势。造成这种反差的原因是:(1)受本旗地理、自然资源、经济

^① M. Banton: *Racial Theories* (《种族理论》),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25-35.

^② 参见李建东《兴和县教育发展情况调查》

落后的制约,民族大专院校的毕业生无法就业。(2)中、高等民族院校蒙语授课专业偏狭,如畜牧、兽医等专业人才已趋饱和,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专业如:畜产品加工专业、乳制品加工专业等无蒙语授课。(3)地方党政机关、行政部门、企事业单位在招工中,表面上要求蒙汉兼通,但在实际录用时,注重的是汉语水平。(4)汉语是社会流动的资本,蒙语被视为贫穷、落后的语言。^①从商都县、镶黄旗、兴和县等地来看,牧民已要求其子女学习汉语,使用汉语。本来人数不多的蒙语学校学生,纷纷转入汉语授课学校,民族学校的蒙语授课逐渐被汉语授课取代,这样,蒙语的沿袭、蒙文化的传承、蒙古族地区经济的发展,都面临着新的危机(也许是一种新的机遇)。

三、职业教育的误导问题

职业教育本是一种民生教育,其目的是为了培养服务本地的蒙古族人才。但职业教育的提出和建立,在当地出现了误导,办学者把职业教育办成就业教育。由于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没有考虑到当地经济的发展状况,职业教育经费不足,师资力量薄弱,培养出的学生既无就业的能力,又无就业的途径。有的旗从1993年开始实行定编,目前各用人单位基本上是超编。每年毕业回来的少数大、中专学生已无单位接受,职业学校的学生更没人要,对于职业学校的学生来说,毕业即失业。这种情况正是少数民族职业教育日趋萎缩的原因。有的旗的待业人员正以每年300人的速度递增,素质不高的待业大军已成为各旗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

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最早建立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在党和国家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已形成了从幼儿教育到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以及各级各类教育的最为完备的民族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从无到有,办学途径多种多样,管理体制日臻完善。在教育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教育并不是与当地的经济发展同步进行。地区贫困化是上述三个问题的主要原因。如何解决少数民

族地区贫困化是一个社会问题。少数民族教育怎样才能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发挥出教育在为地区脱贫致富中的作用,是民族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基本点,亦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所在。

周庆生副教授的发言

承蒙《民族教育研究》学刊编辑部的邀请,能有机会出席今天的座谈会,实在感到很荣幸,谨向滕星主编和其他编委同仁表示衷心感谢。

我是从事民族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双语教育一直是我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发表的论文主要有《中国双语教育类型》(1991年),《中国双语教育的发展与问题》(1991年)和《多民族儿童第二语言学习动机比较分析》(1997年,待刊)等。

近年来,我们集体完成了一项少数民族文字试验推行工作的系列调查,撰写出12份研究报告,每份报告都涉及到双语教学问题,涉及到民族群众对教学用语的态度等等。在这里,我想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在教学用语态度方面所取得的成果,然后再谈谈由此引出的一点理论思考,不妥之处,请在座的诸位同仁批评指正。

在双语教育研究领域,关于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群众对民族教育中教学用语的态度,特别是对本民族语言文字在小学教育中使用的满意程度,过去一直不很清楚。这次调查,初步获得了一些比较准确的数据。

1993年至1995年间,我们采用发放问卷的方式,相继调查了我国南方10个民族对他们的12种民族文字在民族教育中使用状况的满意程度,这12种文字是云南的德宏傣文、景颇文、载瓦文、川黔滇苗文、佤文、拉祜文、哈尼文、西双版纳傣文,贵州的黔东南苗文、布依文、侗文和湖南的湘西苗文。问卷一律用汉文书写。答卷人均为本民族成员,而且具有小学

^① 参见包智明等《镶黄旗教育调查报告》

毕业或初中以上汉文水平,分别从当地自治州、县、乡(镇)的社会各界中随机抽取。

为了便于统计分析,我们将答卷人对民族语文在学校教育中使用状况的满意程度分为4种,供答卷人选择。上述10个民族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选择第一种态度,即认为本民族语言文字在学校教学中用得不够的,一般占答卷人总数的60%~75%;选择第二种态度,即对本民族语言文字在教学中的使用状况基本满意的,一般占15%~30%;选择第三种,认为民族语文在教学中用不用无所谓,一般占7%~15%;选择第四种,认为没有必要用的,一般在8%以下。

以上统计结果表明,如果从民族群众意愿的角度来考察,我国南方民族教育中民族语文的使用情况尚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要求。通过相关分析,我们还发现,在调查问卷中,持民族学校中没有必要使用民族语文看法的人,主要是异族通婚家庭中的成员。有本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中的多数成员,特别是具有一定汉文水平的成员,都希望不要缩小民族语文在不通汉语的民族地区学校中的使用范围和程度;希望“民汉兼通”的教学目标能够真正得以实现。

以上结果启示我们,似乎应对“语言本质”进行再思考。传统说法认为,语言是人类社会的重要交际工具,这种命题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仅仅承认语言是交际工具,似乎还不充分、不全面,因为语言还具有另外一种本质特征,即语言还是民族认同的一种标志,甚至是国家认同的一种标志。比如,今年早些时候,我国外交部曾宣布:鉴于美国等国的新闻发布会历来都是只用英语,不用其他民族的语言,我国的新闻发布会也将进行改革,也将只使用汉语,不再提供英语翻译。这一举措无疑会给那些不通汉语的外国记者带来诸多不便,但是却从根本上提高了汉语在国际外交事务中的地位。

因此,在不通汉语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双语教学,不仅有助于民族学生克服语言障

碍,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益,而且有助于坚持民族平等,维护民族团结,有助于社会安定和边防的巩固。

胡鸿保博士的发言

我是从中央民族学院受了教育后来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从事教育工作的。部分是出于方便

备课的考虑,我为本系本科生开讲唯一的一门课就是“中国民族志”(其中也包括介绍民族区域自治、民族识别等内容)。我发现至少从全校课程名称表上看,这是唯一与中国少数民族关系最紧密的一门课。最近我了解一下,全校学生总数是7767人,其中博士生539人,硕士生1672人,余为本科生、双硕士生、专科生等。少数民族学生约占全校学生总数的6%,为475人。

我个人体会,上述两所大学的校名就暗示教育对象、内容和目标的侧重不同:一个有“民族”,而另一个只有所谓“国民”。滕星主编叹息,不少他接触到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头脑里对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是失真的。

教育是政治话语。正规的、主流的教育是国民教育。所以象人民大学等一些大中专院校那样一谈民族意识和民族性,几乎不考虑中国多元文化的现实,这是很普遍的现象。这些学校往往只开设“中国近代史”、“共产党领导下的全民族抗战史”等等课程。可以说大多数教员、学生不会去思考国内的多元文化,尤其是广义的文化而不仅是“能歌善舞”。从另一个角度想想,除了研究教育而谈比较教育、民族教育之外,正在操作的教育不恰恰正是没有考虑多民族这一现实的教育吗?一般学校不重视多元文化教育,民族地区或民族院校深深感到民族特色被淡化或遭歧视,从两个方面反映出教育的整合功能,它实质上反映出一种一元的精神在起指导作用。我看谨小慎微的多数是研究民族问题的人,说话顾及情感、注意政策;相反,不涉足这个专业的人倒是百无禁忌,“炎黄”、“满清”之类的词语说来朗朗上口,而且文彩飞扬。我们民族学家

充其量现在只能做到向决策者道明利害的地步,还远远没有做到让普通文人,尤其是大众传媒的操纵者了解“民族”的境地,更不要说使老百姓具备民族知识了。所以,民族教育要做的实事真是太多了,要试做新时代的“愚公”。

康健博士 的发言

我曾带过一个新疆班学生,数年后发现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在校时“学习不好”,英语、汉语考试过不了关的学生,包括一些曾受过处分的学生,回到新疆后都工作得很好。他们或身居要职,或是各单位的骨干。相反,有些在校时成绩很好,表现也很好的学生,却不容易适应那里的工作。

由此我感到:我们太缺乏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了解。少数民族学生在进入高校以前,就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评价事物的座标。用他们的座标来衡量我们的规定,他们不一定认同,甚至产生误解。按内地学校培养标准培养出的“好学生”回去后踢打不开,学业平平的学生回去后却能如鱼得水、尽展才华,或许是由两种不同文化圈的差异引发的。

保存一种语言就是保存一个民族,丢掉语言就失去文化的载体。因此,民族教育要借鉴国外双语教育的经验开展双语双文教育,同时也应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教育。建议在中、小学开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开设“中国文化课”。

多元文化教育不仅仅是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需要,同时也是高科技发展的需要。多样性是人类发展的源泉,文化如果都化一了,社会就不会进步了。

座谈会上,在谈到“在多民族国家应该实施何种国民教育”的时候,滕星主编在费孝通教授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启发下,根据多年对国内外民族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与分析,提出了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实施“多元一体化教育”的“多元一体化教育理论”的构想。该理论构想形成的依据是:在一个多民族国家,无论是主体民族还是少数民族,都有其独特的传统文化。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各民族自我文化传递和各民族间文化的相互交往,各民族在文化上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不仅主体民族

社会民主意识和民族平等意识,主要取决于优势民族的看法、态度及决策等。劣势民族的狭隘认识是一种本能的防御。历史上,少数民族曾被压迫、被驱赶。现在多生活在落后的边、穷地区。汉族有责任帮助少数民族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如同对待“老区”。

现在的学校教育体制僵化,容纳汉族的东西都很少,留给少数民族的空间近乎为零。大学生对中华民族的历史都知之甚少,更不用说中、小学生了。学校里爱国主义的教育仅仅表现为升国旗、唱国歌,没有从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角度来进行。这种流于形式的做法应该尽早改变过来。

毛祖桓博 士的发言

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要充分认识民族教育的重要性,要处理好主体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

北京作为文化中心,起到向全国辐射的作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落后,应由文化位势较高的地区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

少数民族研究生及各种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应该走向多元化。

民族地区中青年骨干教师缺乏,流失严重;各种既懂专业知识、又懂管理的高级人才严重短缺。发达地区的高校有责任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急需的高层次人才。在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时候,不要以汉族学校教育的僵死的制度来规范民族教育。那样不利于人才的培养,不利于民族地区的发展。要突破现有模式,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特点,培养出熟悉本地情况的、民族地区急需的人才。

文化吸收了各少数民族文化,而且各少数民族文化中也打上了主体民族文化的烙印,形成了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大家庭中,多民族文化并存并共同组成代表某一多民族国家的“共同文化群体”,即形成如费孝通教授所说的文化上的“多元一体格局”。

“多元一体教育理论”构想认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教育,在担负人类共同文化成果传递功能的同时,不仅要担负起传递本国主体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而且同时也要担负起传递本国各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多元一体化教育”对象不仅包括少数民族成员,而且也包括主体民族成员。“多元一体化教育”的内容,除了包括主体民族文化外,还要含有少数民族文化的内容。少数民族不但要学习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且也要学习主体民族文化,以提高少数民族年轻一代适应主体文化社会的能力,求得个人最大限度的发展。主体民族成员除了学习本民族文化外,还要适当学习和了解少数民族的传统优秀文化,以增强民族平等和多民族大家庭的意识。“多元一体化教育”的目的是:继承各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加强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促进多民族大家庭在经济上共同发展,在文化上共同繁荣;在政治上各民族相互尊重、平等、友好与和睦相处,最终实现各民族大团结。

座谈会上,学者们除了就各自发言的论题进行阐述外,还就一些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如:关于“主流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主体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这组概念的提法哪个更贴切。反对“主流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提法的人认为:提“主流文化”,就必然有对应的“支流文化”,就会将少数民族文化划入“支流文化”之列,不容易让少数民族群众接受。“主体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提法也如此,提“主体”,就会让人联想到“客体”,甚至让人联想到“主人”和“客人”,这种提法更不易被接受。因此,有的学者提出最好用“国家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或者用“普遍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来代替“主流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或者“主体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这一概念。

通过讨论,学者们还提出了以下一些见解:

- 1)多元文化教育并不是单纯的多元文化知识的灌输,其目的在于培养一种能够容纳多种文化的态度。
- 2)评价少数民族学生的标准应多样化。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方法应灵活多样。
- 3)学校,尤其是民族地区的学校,因受制于该地区落后的经济,教给学生的东西要具有再生功能。以学历小、能力大为学校教育的目标。
- 4)高考制度应体现真正的平等,把对少数民族学生采取降分录取的照顾做法,改为增加民族语言文化课考分。
- 5)有关国计民生教育的座谈会,除了邀请专家、学者外,还应邀请政府官员、新闻媒介人士参加。

(整理 伍隆萱 董艳)
〔本文责任编辑 伍隆萱〕